

二战后德国何以成为“正常国家”？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孟钟捷

这段艰难、曲折乃至迂回的反省之路，德国人走得并不轻松。

曾经困于“受害”心结

“谁才是受害者”的困惑曾让德国人纠结：的确，遭受盟军空袭的德累斯顿与慕尼黑的老百姓们似乎有充足理由为自身哀鸣。不过，1996年设立的“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罗列了一长串名录：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优生学受害者等。德国人被告知，他们应自视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

“英雄父辈”的宣传为绝大多数军人家属们带来引以为傲的资本：不错，为“祖国”走上前线，听从命令、杀敌冲锋乃至献身疆场的将士们，似乎应得到后辈子孙的无尽颂扬。但是，历史学家们组织了数场武装部队在前方施行屠杀的展览，一下戳破了“武装部队清白神话”，让观众们发出自省之语。

“为民族未来赢得光明”的呼吁契合了不少右翼政客们的心理：战后出生的德国青年人由于“晚生的幸福”，似乎从此告别“希特勒的阴影”，无须再面对“无法过去的过



二战结束后，所有国家都期待尽快恢复“正常”，战败国当然也不例外。七十年过去，再看这段“正常化”之路，德国无疑是所有战败国中做得最成功的一个：

大屠杀幸存者不再对它“咬牙切齿”，当年的受害国几乎都成为它的友邦，它的政府连同大部分国民向世界交上了几近完美的“反省状”。

去”。但现任德国国会议长拉梅特说得对：“对于我们国家的恐怖历史，后生者别无责任；但是与这些历史打交道，后生者别无旁贷！”

外在压力促使反思

为什么德国能够拨开心结，走出历史迷雾，最终成为“正常国家”？首先与外在压力密不可分：

一、大国钳制，德意志军国主义狂热难以复兴。尽管美苏英法四大盟国合作占领德国期间彼此矛盾重重，旨在彻底改造德国的非军事化、非工业化、非纳粹化和民主化并不彻底，效果有限，但纽伦堡审判、分割普鲁士、开除纳粹公务员等举措仍然起到了一定的教育民众之效。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的战后重振被置于大国的严密监控

之下，任何政治家都不敢逾越雷池半步，随意鼓吹“民族复兴”。

二、欧洲合作，德意志历史反省成为必要前提。二战后，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欧洲不得已开启了一体化进程，德国必须找到与宿敌法国和解的途径。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两国从煤钢联盟走向全面和解，并在新世纪初携手共编历史教科书。类似举动也出现在德国和波兰之间。不仅如此，德国还改变了中世纪以来长期奉行的“德国之欧洲”外交方针，转而推行“欧洲之德国”新战略，乃至把维护欧洲一体化作为外交政策的底线。

三、受害者紧盯，德意志国家认罪不可一日懈怠。从犹太人到吉普赛人，从政治犯到优生学受害者，从同性恋者到盟国战俘，各式群体都在战后经历了长期不懈斗

争，才得以被列入“纳粹受害者名录”。特别是犹太大屠杀幸存者，或扮演“纳粹猎手”角色，或在美国组成声势浩大的院外集团，成为严厉督促德国一步步改进认罪意识的主要推动力，“奥斯维辛”一词也上升为纳粹罪行的核心词。

三群体成内在力量

外在高压仍需转换为内在信仰，方能决定性地塑造反省意识。这种内在力量主要源于三个群体：

德国政治家们不论左右，都愿意正面应对“不堪的过去”。阿登纳决定与以色列建交，并主动赔偿；勃兰特以“华沙之跪”树立德国认罪的形象；科尔在德国再统一之际清醒地承诺不改变波德疆界；施罗德提醒国民“德国人需要的是

一种经过自我反省之后的自信”；默克尔更是多次表态“只有深刻地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

左翼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德意志思想史上的批判传统，以社会良知的自觉心来维护“宪法爱国主义”。上世纪60年代，他们反思“平庸之恶”；70年代，他们追问老教授们曾扮演的“可耻角色”；80年代，他们在“历史学家之争”中冲锋在前；90年代，他们从一次次公共历史争议中发现大众启蒙的新途径；新世纪以来，他们不遗余力地阻击任何形式的新纳粹运动。

多数青年人并不讳言“父辈罪责”，甚至积极投身各种批判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战后七十年的历史教育基本沿循从揭露到批判再到反思的道路前行。上世纪70年代末起，纳粹历史与大屠杀成为历史教科书中二战部分的主要内容。因而，当一代代青年人成长起来，战争反思意识并未消淡。

正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德国人才能让正向的历史观成为立足当下、走向未来的无形力量，这恐怕是其他渴望“正常化”的战败国应该学习的对象。

日本二战后七十年来的反思之路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王少普

日本正处在对发展道路作出历史性选择的关头，为此不能不回顾二战后日本的反思之路。

宪法体制派发挥影响

第一阶段，宪法体制派发挥重要影响。大致从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至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前。

此阶段，驻日盟军总部根据《波茨坦公告》，对日本进行了战后处理和民主改造。除盟军总部的作用外，也与宪法体制派战后反思的进步性密切相关。

战后初期成立的日本社会党，在建党宣言中明确宣称“反对一切军国主义思想与行动”，要求“彻底放弃军备”。针对政府想维持以国家神道为指导的教育原则，进步学者成立“民主教育研究小组”等，力主建立新的“教育基本原则”。

在盟军总部和进步力量共同推动下，1946年11月，日本和平宪法颁布。次年3月，根据新宪法原则制定的《教育基本法》规定，“必须把新日本建设成和平的文化国家”，和平国家的教育要“回到正确道路”，要求教科书记载“日本侵略中国”等内容。6月，日本各都道府县教职员工会成立“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教组），在坚持和宣传正确历史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日本文部省和民间出版社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都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及其他侵略史实。

日美安保体制派主导

第二阶段，日美安保体制派占主导地位。大致从冷战开始到2012年12月安倍内阁成立前。



战后日本政治力量分为三派：宪法体制派，主要由自由民主主义者和左翼力量组成，核心理念是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日美安保体制派，主要由保守势力组成，核心理念是以日美同盟为日本外

交、安全主轴；改宪再军备派，由保守阵营中的右翼势力组成，核心理念是在传统的国家主义指导下实现国家“正常化”。日本的反思围绕三大派别的斗争展开，分为三个阶段。

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新的对日方针，要点为：迅速着手对日媾和工作；尽快进行美日双边安全保障协定谈判；援助日本，使其在经济上独立，能够从事美国及亚洲非共产党地区需要的商品生产及劳役。

日本吉田内阁顺应了美国政策的转变，主张“国内治安可以依靠自己力量来维持”，但对外只有依靠同美国“缔结防御协定”保障安全。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签订，日美安保体制派迅速成为日本政坛主导派别。

美国对日政策右转必然对日本战后反思造成重大干扰。1951年5月，驻日盟军总部允许日本设立“政令修改咨询委员会”，“纠正占领时期过度之处”。《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签订不久，该委员会便要求将教科书中“日本侵略中国”改为“日本进出大陆”。岸信介内阁对战后出版的进步教科书大加挞伐，要求将日本侵略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鼓吹其给亚洲带来“独立的机会”，对民主进步力量痛下杀手，在东京都教师反对强化思想控制的“勤务评定”斗争中逮捕28名日教组成员。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长森户辰男撰文呼吁“有必要从根本上反省战后的‘和平国家与和平教育’”。在此背景

下，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屡屡亮相。日本和平民主力量进行了还击，著名的有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家永三郎为反对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倒行逆施而提起诉讼等。

在日本与国际社会和和平民主力量推动下，宫泽、河野官房长官以及细川、村山首相相继发表谈话，就教科书、“慰安妇”以及日本所发动战争的性质和责任问题表明了态度。村山首相对日本进行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日本右翼势力猖狂反扑。“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日本会议”等维护皇国史观的组织相继成立，污蔑承认侵略是“思想犯罪”；歪曲东京审判是“复仇仪式”；攻击“东京审判史观蔓延，招致对各国的道歉外交”等。虽然因和平民主力量抵制，以及美国对此尚保有一定警惕，这股逆流没有泛滥到淹没整个日本社会，但影响已相当严重。

改宪再军备派渐抬头

第三阶段，改宪再军备派抬头。大致从2012年12月安倍内阁成立至今。

日本右翼对失败和放弃战争是不甘心的，改宪再军备要求在和平宪法颁布之初便已出现，岸信介

是代表人物之一。1952年他出狱不久，即组“日本重建联盟”，要求“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任首相后又成立“内阁宪法调查会”，推行修宪。在吉田茂“先经济后军备”的主张中，也包含这样的要求。1963年，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吉田茂表示，“在当时日本要再整军备，无论就经济、社会还是思想而言，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内外条件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如果在防卫上不改变总是依赖他国的情况，作为国家应该说是处于残缺的状态”。

不过，当时美国的对日态度，虽然为了加强利用，在控制上有所放松，但还没有到允许其解禁集体自卫权、挑战和平宪法的地步，改宪再军备派在日本政坛尚难抬头。

冷战后，为应对世界多极化，美国对日政策再次调整，2000年要求日本成为“东亚的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2010年提出“亚太再平衡”，上述意图更为明显；去年决定升级日美安全同盟，明确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利用美国政策的变化，改宪再军备派逐步抬头。2003年自民党提出修宪草案，要求宪法写明“为保证国家独立和安全，可行使个别自卫权和集体自卫权”。2012年出台更右的草案，要求将自卫队改为

“国防军”。安倍去年7月以内阁决议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今年7月又在众议院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

与上述行动相配合，改宪再军备派加强了在战后反思上的错误宣传，公然声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对甲级战犯的判决是根据“战胜国判断裁定的罪名”；“《波茨坦公告》作为中美英联合发布的官方文件，仅代表同盟国一方的政治意图，当时的日本政府只能选择接受投降”。

前进方向决定于人民

战后发展道路上出现前所未有的倒退，激起日本和平民主力量强烈反对：成千上万民众上街游行示威；90所大学师生成立反对新安保法案组织；多家主流媒体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国民不支持新安保法案；12万人包围国会，要求“安倍下台”“废弃安保法案”。

改宪再军备派陷入尴尬境地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人民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战后反思，正如74位日本学者在“首相70周年谈话应深思熟虑”声明中指出的：“日本国民的不懈努力，带来了战后的复兴与繁荣。而这种努力，是基于认为对中国台湾及朝鲜的殖民地统治以及1931至1945年战争是重大错误的认识之上的，是基于对这场牺牲了三百多万日本国民和数倍以上中国及其他各国国民的战争的沉痛反省之上的，也是基于不再重犯过去错误的决心之上的。对战争中牺牲的人们的强烈的赎罪之感与悔恨之念，是支持战后和平与发展的原动力。”日本的前进方向最终还是要由日本人民决定。